

它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欠缺较为全面的研究;对民国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新学术群体的崛起、新学术机构的建设,近人对清代学术的清理和总结,近人中国传统学术观念的变迁等,尚欠缺有力的研究,这些都有待人们去弥补。

研究民国学术史应该清理的基本问题包括:一、民国学人对中国传统学术史的认识及其总结。二、晚清传统学术的变异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机缘。三、新学科框架的建构。诸如传统的分科体系、西方的科学观念与学科观念的传入、清末民初引进的西方学科体系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对应关系、西方科学观念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解构等问题。四、西学的输入、西学译介主体的转换(从外人到国人)与中西学术交流中“格义”方式的转换。五、社会转型与时代对新学术的呼唤。转型时期民国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民国学人“学术独立”品格的养成。六、从晚清到民国,学人(以江藩、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钱穆诸人为代表)对清代学术遗产的清理与总结。七、新学术范式的诞生以及民国学人对新学术范式的争论和检讨。如文学领域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历史学领域的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哲学领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八、新学术机构的建设、新学术社团的出现。如北大文科研究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研院史语所等新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及其学术工作的开展。九、“整理国故”之观念的由来及其成绩。从《国粹学报》的国学研究到《古史辨》的历史研究,民国学人对“整理国故”的检讨。十、民国历史学的新发展。诸如新史料的发掘、新史学方法的传输、新史学体裁的出现、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传统史学的继续发展等问题。十一、哲学学科的设置与发展。如北大哲学门的设立,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确立与书写,西方哲学理论的译介与研究,逻辑学研究的开展。十二、民国文学研究的新发展。如“文学革命”带来的文学观念变革,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拓展,西方文学理论与作品的译介。十三、以辜鸿铭、胡适、林语堂等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译介。十四、外人与民国学术的互动及其影响。如罗素、杜威、泰戈尔等人在华的演讲活动及其影响,以及欧美、日本汉学家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及其互动关系。十五、民国学术的历史地位及其估价。

民国学术史研究已有相当雄厚的文献基础。新时期整理出版的大型民国学术史方面的资料有:《民国丛书》(上海书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民国学术经典丛书》(东方出版社)、《国学丛书》(华东师大出版社)、《民国学术文化名著》(岳麓书社)、《中国近代思想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近代国学文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民国时期国学期刊汇编》(巴蜀书社)这些都为研究民国学术史提供了必备基本资料来源。

客观地描述民国时期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演进,再现民国学人为推进中国学术所做的艰巨工作,清理他们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当代中国学术向前推进所应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们相信,通过展开民国学术史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晰、更细致、更客观地理解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状况,而且对推进当今的学术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民国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及其局限性

左玉河 (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在近代学术制度转型过程中,效仿西方逐渐建立起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体制。这套现代

学术体制,是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中心,包括新式学会、学术期刊、现代出版业、近代图书馆、现代基金会和学术评议会诸多要素在内的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评估、学术奖励及学术资助制度。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及由此带来的学术研究职业化,是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和主要趋向。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创建及其职业化趋向,为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和体制保障,同时也带来了学术研究功利化、肤浅化和庸俗化等弊端,影响着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

一、学术体制对民国学术发展之制度保障

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活动,是在近代以来创建的现代学术体制规范下进行的。现代学术体制为民国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保障。古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是一种体制化不甚发达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爱好。近代以来,随着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机构及新式学术社团的相继建立,学术研究逐渐成为探求知识的职业化活动。学术研究者逐渐从政治体制中剥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及其传播的职业学者。这些职业学者有独立的学术追求,有自主的学术理念,有独特的学术研究方法,与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迥然不同。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体制和研究所体制、学会制度,以及图书馆、出版、基金会等学术文化设施,从制度上保障了民国学术研究的开展。相对独立的现代大学、研究机构的创建,使学术研究逐渐摆脱政治束缚而日趋独立,现代学者日益脱离对政府的直接依附。尤其是学术与政治界限之日趋明晰,传统中国的官学一体化格局被根本突破,与“政界”对应之相对独立的“学界”逐渐形成。

不仅如此,中国现代学术体制还有效地保证了民国学术研究活动的正常运转,为民国学术研究之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民国时期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不仅是学者们的个体性行为,而且是在现代学术体制中按照现代学术规范所进行的社会化活动。民国时期社会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得到了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大体说来,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是由掌握了专业知识的职业学者承担的。职业学者是在相对独立的专门研究机构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授的,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有着较为可靠的资金和设备保障,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通过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刊的平台进行交流,其成果有着统一而相对公正的学术标准加以评估并得到相应的奖励。集中于学术研究机构及学术共同体内的职业学者,以学术期刊及学术年会为媒介,相互间频繁地进行学术交流和思想砥砺,从而加快了民国时期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速度。近代以来知识生产日益专业化和学术研究日趋深化的趋向,推动着民国学术研究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发展。因此,现代学术体制不仅保障了民国学术研究的正常运转,而且使民国学术得到了迅速推进。总体上看,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历程与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创建过程是同步的,是伴随着现代学术体制的逐步建立而演化推进的。民国时期在各个研究领域出现了众多的大师级学者,产生了许多有深刻影响的研究成果,显然与近代以来创建的现代学术体制所发挥出来的制度保障密切相关。现代学术体制为民国时期大师级学者的出现,以及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的产生提供了制度保障。

正因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是体制化的学术研究,故传统读书人那种依据个人兴趣而从事的自由研读之风在民国时期日趋衰落,民国学者难以离开现代学术机构而仅凭个人兴趣进行学术探讨,他们的学术活动逐渐被纳入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内进行。现代学术体制是民国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平台,大学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民国学者容身的主要场所。正因现代大学、专业研究院等学术机构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心,故民国学者多将谋求到条件较好的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顾颉刚从苏州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广州,复从广州到燕京大学任教之经历,便

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为了谋求学问上的进步和追求知识之理想,顾颉刚从苏州来到当时的学术中心北京。正是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这种现代学术机构中,顾氏利用充裕的研究时间与丰富的研究资料,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现代职业化学者不能不考虑生计问题,不能不“为稻粱谋”,不能不解决“为知识而知识”所必需之生活问题。由于顾氏任教的北京大学欠薪甚多,难以维持其最基本的生活,故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其他学术研究机关:“不幸北大欠薪过多,无法维持我的清苦的生活,不得不应厦大之聘而违了不出北京的素愿……我这时到厦大,并不是要求得意,乃是在北京无法维持我艰苦的生活,暂一出避而已。”^①很显然,现代学术体制下之职业学者,面临着“求知识”与“稻粱谋”之间的巨大张力。

离开北大而主持厦门大学国学院的顾颉刚,生计问题暂时得以解决,但付出的代价是承担大量而繁重的行政事务,耽误了大量学术研究之宝贵时间,多少改变了其“求知识”之初衷。故其抱怨说:“到了厦大以后,为组织研究院,学术会议,事务会议,天天开。我受职务的规定,不得不天天到,费去许多可以做研究工作的时间,已不堪其恨。”为了金钱及改善生存状况而牺牲宝贵的研究时间,对职业学者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从厦门国学院到中山大学后,顾颉刚因功课事务繁忙,更是难有充裕时间从事专门之学术研究,故内心异常痛苦:“自从回粤之后,功课事务纷至沓来,也没有做成一篇研究文字。去年还有两册笔记,今年竟无一字了。”^②他感叹道:“照现在这样的做下去,不到五年,我是一个落伍者了,我完了,我除了做学阀之外再没有别的路了!”他怨恨自己“已为名缰利锁所囚禁了!”^③

1928年春,燕京大学邀请顾颉刚前去专门从事学术研究。顾氏认为:“我觉得这是很合我的宿志的,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时间供我从容的研究,才可使我心安理得地过生活。所以便答应了。”此时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亦欲聘其到院做专门研究。中央研究院显然是比燕京大学条件更好的学术研究机构,故顾氏婉转回绝了燕京大学而接受中央研究院之聘请。但顾氏离开中山大学之举,引起了傅斯年的不满,两人间裂痕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顾、傅矛盾之背后,很大程度上是职业化学者“探求知识”与“为稻粱谋”间的冲突。顾氏在中山大学有着优厚的薪水,有着令人羡慕的地位和学术名声,为什么仍然要离开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广州的学术研究环境,根本无法与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相比。他总结说:“我若是要名要利,则中山大学所以待我,孟真所以为我设法者确已不薄,我应当感激不已,却之不去。不幸我的目的不在名利而在别的。我便不能因有饭吃了故而舍弃我的真生命。”顾氏之“真生命”便是从事纯正的学术研究,而不是追逐名利。他向胡适之倾诉,表达了其回归学术研究中心之迫切心情:“我这几年的烦闷,愤怒,希望,奋斗,我有一中心问题,便是想得到一个研究的境地。除了这件事,什么名,什么利,都不在我心上。”^④顾氏所谓“想得到一个研究的境地”,实际上就是一个能够保证其专心治学之现代学术研究机构:“这研究的境地,中山大学给我也好,中央研究院给我也好,燕京大学给我也好,我毫无成见。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供给给我,我便用整月整年的功夫研究我心中蓄积的几个问题,并按日程功的读书,增加我的常识。”^⑤

在学术研究日益体制化的境况下,民国学者的学术研究难以远离学术研究中心及学术研究机

①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1页。

②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532页。

③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538页。

④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535页。

⑤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第537页。

构。顾颉刚迫切需要现代学术体制所提供之“研究的境地”，迫切渴望进入现代学术中心以从事专门化的学术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学术体制对民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之极端重要性。

二、体制化对民国学术的消极影响

尽管体制化为民国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保障，对民国学术发展有推进之功，但体制化及由此出现的学术研究职业化，同样带来了学术研究功利化和学风浮躁等消极影响，严重影响着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创建的现代学术体制，使学术研究趋于职业化，社会职业与研究志业日益分途而进。在中国传统读书人那里，道德文章合而为一，职业与志业须臾不离。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化趋向。学术研究者逐渐成为现代学术体制中的专业化的职业学者，不是将学术研究仅仅作为一项神圣的事业和志业，更多的是将其视为一种谋取生活资料的社会职业。对于民国多数学者而言，以学术研究为社会职业的现象日益普遍，而将做学问视为神圣志业的选择则显得相当艰难。因为他们必须首先将学术研究视为社会职业，优先考虑如何谋取生活资料以养家糊口，然后才能谈得上将学术研究作为高远的理想和志业。故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下，民国时期的职业学者为生计而奔波之现象显得格外突出。

民国学术研究逐渐职业化后，职业学者研究学问之目的既然首先在于解决生计问题，那么大学教授“为稻粱谋”而敷衍者便日趋普遍，自然影响了其对“纯粹学术”之追求。有人指出：“吾国自开办学堂以来，最良之教师，亦不过云教授有方而已，若曰研求真理，则相去甚远。”^①从事学术研究之职业学者因为难以维持其基本的生计，很难去追求所谓“纯粹学术”，遂不得不牺牲学术研究而趋向于“为稻粱谋”。这种状况，遂使民国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功利化及学风浮躁等弊端，至于由此引发的现代大学中教授与学生关系疏离的现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作为职业化的知识传授者及生产者，大学教授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从事学术研究所得到的收入待遇和经济回报，实际上是以自己掌握的专门化“知识”换取生活资料以谋生，带有明显的“知识买卖”色彩。因此，民国大学体制下出现的师生间情感隔膜并导致学风浮躁等弊端，显然是学术研究体制化及职业化的必然结果。

现代学术体制中的民国学者，多数已经不像传统读书人那样以弘道、传道为学术理想，而是以探索知识和传授知识为现实目标，其著书立说首先考虑的是“为稻粱谋”，故必然导致其治学风气的实用、功利、浮躁和浅薄。时人谢国桢尖锐地指出：“窥今日学风，造成之因，实由经济之压迫，莘莘学子其唯一之目的，希早以有自见。得一罕见之书，中秘之本，纂辑排比，瞑搜夕抄，不数日而成巨帙，一跃而为专门之学者，经济问题，庶乎可以解决矣。”^②民国时期逐渐形成的快捷化的成果发表机制和商业化的传播体制，对当时的功利浮躁之学风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时人潘光旦抨击说：“肤浅之病，不仅于短篇之作品见之，其较大之编译品亦未能免。近年来各书坊之出品中，有所谓百科小丛书、常识丛书、新时代丛书及各种百科全书等，其内容大都浅率简陋，鲜有可以称为著作者。”^③不仅潘氏有此议论，蒋梦麟对于当时学术界、出版界学术品位低的情况也作了揭露，并敬告学者当忠实于学术：“读者试观今日之出版物中，有明明抄袭而成也，则美其名曰著；明明转译自日文，而曰译自英

① 《理科研究所第二次报告》，《北京大学日刊》第6号，1917年11月22日。

② 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6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40页。

③ 潘光旦《近年来之知识介绍》，潘乃穆等编《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文、法文或德文。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①学风趋于功利浮躁,必然影响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

在近代中国商业化冲击和商业资本运作之下,学术商业化和功利化日趋严重,民国学界确实出现了不少思想肤浅、学术水平低下之作。潘光旦指出:“哲学家与教育家既倡之于前,著作家与出版家自必从而和之于后,自此非浅易之文不作,否则将无读众;非通俗之书不印行,否则将无买主,而读众与主顾之多寡,一视浅易之程度而差,诚以不如此不足以顺合潮流也。夫一端有浅率易与之读者,一端有惟利是图之出版界,而居其间者复有多数专恃稿费为生活之学问家与借稿费为补助之学生,从而扩大其供求;供求之间,一推一挽,而知识介绍事业乃若水之走坂,愈趋而愈下矣。”^②朱自清亦分析道:“从前人著述,非常谨慎。有许多大学者终生不敢著书,只写点札记就算了。印书不易,版权也不能卖钱,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们学问的良心关系最大……现在我们印书方便了,版权也能卖钱了,出书不能像旧时代那样谨严,怕倒是势所必至;但像近些年来这样滥,总不是正当的发展。早先坊间也有‘大全’‘指南’一类书,印行全为赚钱;但通常不将这些书看作正经玩意儿,所以流弊还少,现在的‘概论’‘大纲’‘小史’等等,却被青年当作学问的宝库,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无窒碍。这个流弊就大了,他们将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③在知识产品商业化潮流下,民国学术研究出现肤浅化和庸俗化,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总之,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是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进行的专门化研究。学术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以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学术研究者逐渐成为职业学者,并被吸纳到现代大学、专门研究机构、新式学术团体、专业图书馆、科学实验室及学术期刊构成的现代学术体制之中。这套日趋完善的现代学术体制,为民国时期职业学者的生存发展及其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既然身处现代学术体制内的职业学者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承担者,那么,体制内的学术研究便自然成为民国学术研究的主流,建制化的学术研究机构因而成为民国学术研究中心。作为传统学术研究中心之书院被现代大学及学术研究机构取代后,那些仍然创办书院及聚集于书院中从事学术研究者(如章太炎、唐文治、马一浮等)因未能进入现代大学及研究所等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中,难以被体制内主流学术所认同,故处于民国学界之边缘地位。由此可见,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和职业化不仅规范着民国学者的学术活动,而且制约着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

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双重路径

阎书钦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一项重大使命。为此,应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虽然晚清学人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有初步了解,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始于民国时期。这亦是中国学界利用本土资源,对西方学术潮流回应的结果,其进程表现为双重路径:一是科学观念普适化,各派学者在将科学观念普及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基于各自的学术理念,对科学观念提出不同的理解,尤其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唯物辩

① 蒋梦麟《和平与教育》,《教育杂志》第11卷第1期,1919年第1期。

② 潘光旦《近年来之知识介绍》,潘乃穆等编《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③ 朱自清《论青年读书风气》,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334页。